

党史教学与研究

2

中共党史学会(筹)

党史教学与研究

2

本期由杭州大学中共党史讲义编写组编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说 明

本期刊载的《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那里？》、《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两文，均请有关部门与原件进行了核对。凡原件中一些明显的漏字、错字，我们仍按原件排印，只在后面〔〕内作了些订正。凡原件中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则用□表示。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这种订正可能有错，仅供参考。

何干之同志的《张国焘路线和党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文，原是记录稿，这次刊登前，曾请刘炼同志作了校订。

目 录

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那里？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凯丰（1）

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

（一九三七年四月）……………（43）

张国焘路线和党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何干之（53）

深切的怀念……………（70）

• 简讯 •

中共党史学会筹备会会议纪要……………（72）

• 消息 •

张国焘在加拿大病死……………（76）

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哪里？

凯 丰

1925—27的大革命因陈独秀主义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失败。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封建残余，残酷的压迫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坚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继续打倒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在当时不得不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即实行土地革命，以苏维埃为民主革命的政权形式，并建立起工农的武装——红军。中央在九年来坚持这个方针，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团结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成为中国革命中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新的革命高潮中主要的发动力和主要的条件。

从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后，尤其是进攻河北后，国内的政治情势是在激烈的变动，阶级力量在重新的结合，党的政策也依据这种客观的情势而有了根本的变动，即一切新的政策的出发点，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以解救目前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为中心，今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成绩，只有过去九年坚持不动摇的奋斗才可达到。

误的同志又不满意，在这里不得不将过去的争论加以叙述，给国焘同志错误的实质加以分析。

先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争论说起。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曾经这样估计那时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势，在分析了当时日本进攻华北和全国革命运动发展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沙窝会议1935年8月5日决议）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在1935年6月，那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组织“华北国”，在国际上法苏协定正在谈判中。在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关于战略问题的会议后，接着又讨论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对日本进攻华北的问题发表过宣言。

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定是根据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当前的敌情而规定的。党对当时的战略问题曾这样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的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8日的决定）

在当时，党中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对于军事战略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包括国焘本人也在内。他那时在会议上在口

头上是同意中央的这种估计和决定的。可是在事实上在行动上他是不同意的。虽然当时他不敢发表公开的反对的意见，然而在他自己的行动中有与中央相反的估计。

在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他就把他的整个反对中央的意见发表了。国焘同志认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

“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见国焘同志在道孚报告）

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虽然中央与国焘同志之间有基本的原则的分歧，中央估计到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退出中央苏区这是革命部分的挫折，但同时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焘同志认为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

国焘同志继续在他的同一报告中说：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作这种过份的估计。”（同上）

依照国焘同志的分析，民族革命的高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来临”。这已经是倒退了五年！因为“九一八”后中国的民族革命大高潮已来临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暂时挫折的停止，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是继续的发展，那么这种会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作这种估计，那么已经不是“冷静的考察”，而是“冷血的考察”。

国焘同志在自己的同一报告中继续的说：

国焘同志只认为他在过份估计了五次〔反〕围剿的损失以及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减员和疲劳现象。当然他确是过份估计了这些。下面将论及，但这不是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是在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国焘自己也曾公开承认：

“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道孚报告）

既是进攻与逃跑路线，何能缩小到“减员和疲劳的程度”？很明显的他这里是想躲避中心问题。国焘曾公开宣言反对逃跑路线，而自己却以进攻路线自居。可是他又说“我们都在退却”这是他的退却中的“进攻”路线。

因为有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歧，在决定军事战略时，也不能不发生基本的分歧。

（二）军事战略问题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敌情，一贯的主张北进。在上面我们已引了两河口会议所通过的党中央的战略计划。在国焘同志动摇此计划时，党中央坚决领导一、三军（陕甘支队）实现此计划。因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敌情的估计，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国焘同志在会议上在口头上虽承认这一计划，但是在行动上却不愿意执行这一计划。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另一个战略计划。他认为当时“我们都在退却”。所以他的战略计划是继续的退却，他的战略计划就是退到西康去，他的战略计划就是川康计划。

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一致决定了北进的计划。但是国焘回到理番脑〔杂〕谷脑后，却不公开反对这一计划，藉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开动。中央不顾一方面军的疲劳，继续向毛儿盖开动，以便求得先机占领松潘。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经几次的曲折才到毛儿盖。到毛儿盖后，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满解决，于是又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在这种怠工执行决议之下，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于是又有沙窝会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在这时，虽不能出松潘，但北进还有可能。国焘又提出出阿坝的计划。如是他又单独率领一部出阿坝，以延宕北进之实现。中央在当时委曲求全总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中央为达此目的，不得不督促右路军（一三军，卅军，四军）先向班佑阿西包座开进，以待左路军（九军卅一军卅二军五军卅三军等）之达到。但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座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仑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

国焘同志的川康计划是根据他对于“我们都是退却”的估计来的。在他认为我们还应继续退却，退到西康去！

国焘同志不主张北进除了根据他的政治估计出发外，他确是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骑兵的恐惧，他把北方的骑兵形容得是不可战胜的妖精！国焘同志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曾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发表如下的意见：

“右路军打了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飡，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

得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部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彩病号丢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有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1935年10月10日，“政治局”会议国焘报告，黄超记）在他看来，北进只是一黑团糟！幸而马克思有灵，一、三军没有被骑兵活捉去！！

阿坝会议的决议就是国焘同志同一的观点之下写的，阿坝会议决议这样估计北上的问题：

“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天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中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阿坝会议决议）

也是靠列宁在天之灵，一、三军还没有冻死饿死！

国焘同志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从对政治形势右的估计与对敌人恐惧的观点出发，可是在他“从现在看过去”一文内，并没有从这里去揭发他的错误，他反认为：

“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和策略上的争论”。

这种假定当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的事实是从政治的分歧出发的。而且国焘曾经屡次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明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 是 逃跑路线，何能在这种不存在的假定之下，忽然一变而为“军事策略的争论”。这显然是想把当时争论的原则问题掩盖起来！

国焘同志虽没有公开承认他当时的川康计划，但在最近

的一篇文章已吞吞吐吐说了。

“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计划”。（“从现在看过去”）

当然比较川西更西北的地区只有西藏、西康。如果还想再西，那就只好到西天去！

国焘同志的战略计划，就是在他的“我们都在退却”的观念之下，退到更“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对于土司确是安全，对于革命者则一点安全也不会有。

他曾屡次地主张在川康建立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干部会议有人反对他的这种意见，他故意把反对他的意见加以曲解。他把“瓮中捉鳖”一个比语，曾认为这是悲观失望。后来从没有放弃在西康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后来他更发挥他的理论：

“外蒙已经可以得到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样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

“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的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均见“干部必读”）

国焘的川康计划，当然他不得不留意这些地区。他虽然援引了外蒙为例可以建立根据地，但实际上却没有建立他的根据地。

当然党中央与国焘在战略上的分歧主要是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第一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的分歧；第二对于建立根据地选择上的分歧。

中央认为在川康番人区域事实上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即

使能建立根据地，也要使党与红军脱离全国革命的领导。

这是战略上分歧的基本点。

（三）南下北上的问题

本来南下北上就是战略里的问题，因国焘特别发挥他的南下北上的理论，他认为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 是逃跑路线；他认定南下是胜利，北上则为失败；他认为南下和北上是争论的中心，后来他又认为争论的不是南下或北上；而且他现在还坚持“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因此不能不说一说这一问题。

所谓北上就是党中央所决定的北进战略计划，国焘同志认为是北上退却逃跑路线，他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干部必读）

如果北进真象国焘同志所描写的又有骑兵，又有堡垒，又有飞机，又有敌人雄厚的兵力，天气又冷，人口又少，回民又不好对付。那么我想一个真正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决不会往这样的地方去逃！我想国焘同志所指的是说北上是“一直想到苏联去”！（见记录）

虽然国焘屡次想把他的南进描写成为是进攻路线。可是他的南下只是为着有大米吃，所以他在南下的动员口号就是打到天全芦山去吃大米！

实际上他的南下只是为着实现他的川康计划，或者就是

他的所谓“杀回马枪”。在他自己的报告中说：

“……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闯，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昆都仑河终〔总〕是没有办法渡过，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坚决的反抗”。（道孚会议）

如果照他自己的说法，南下是“要回马枪”！他的进攻路线却是与要回马枪相等。如果照中国戏子的“要回马枪”，那么总是在自己准备退却时，给追击者以回击，或是在退却中给追击者以回击。不知道他的回马枪是否是这样一种要法！

一四方面军在阿西分开后，一方面军在坚持自己的北进方针，经过俄界，拉〔腊〕子口，哈达铺，那时还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反省，随一方面军后跟进，一方面军为什么要单独北进，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坚持中央既定的方针；第二想用一方面军的先锋作用，证明给国焘同志看，北进是可能的，而且为四方面军开辟道路，以便他们在一方面军后跟进。

中央9月14日给朱、张的第七电中明确的说：“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难〔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卅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他们的北上”。

在到达哈达铺后，又有数天之停留等候国焘并电劝国焘率部北上。

当一三军开始北进时，国焘预料一定不能北出，因此屡次表示他的“诚意”，要一三军“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一三军出哈达铺后他又预料一定会被消灭。因此他也曾表示“猫儿哭老鼠”的哀悼！

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经详述南下

的不利，并劝其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在第五电中中央指出：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国焘对中央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见给徐陈指令与国焘第六电）

国焘这时仍是一意孤行，向南开进。在达到天全后，国焘来电证实他的南下进攻路线的胜利。在退出天全芦山后，又对南下胜利作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估计：

“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牵制与吸引敌人使一三军能够顺利地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顺利地发动运动战”。（道孚报告）

不知他的“相当意义”有何解说。如果他的胜利，仅在他的“预定目的”是为了作为一三军的牵制队，那到〔倒〕他的预定目的是达到了，那么红军全部北进，作为一三军的突击队，其帮助不更大吗？如果当时全部北进，我想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更要急转直下，而我们在统一战线的成绩将比今天更大。

我想南下不但完全失败，而且是南下路线破产崩溃的开

始!南下的失败完全证实中央当时的估计:“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可是国焘在最近的文章中还不承认这种错误。他还认为“南下也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如果要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何不把红军带到黄河里吃水呢?他还认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如果南下不是失败,为何又倒回北上呢?

国焘同志想用一种外交的言词把过去中央对于“南下是绝路”的估计的正确,来抵消他对于北上估计的污蔑。他这样说:

“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南下是死路,来掩盖他的继续逃跑,在这些的估计下,当然他要作些组织上结论,但是真象不明。……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建立了苏区,并开始形成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不知在何处!不知是否指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凯。)自回师西北以来,使我们的部队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进步,……毛泽东同志的话当然没有说对,现在当然是要收回去的。也许这里会有人说,毛泽东输了吧!当然,倘若当然他说对了,他只能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不会有丝毫好处的。他的没有说对是非常之好的”。

“其次当毛泽东同志向陕北去的时候,也许有人估计在这样机会主义的路线之下,必然会葬送一三军,(国焘当时就这样想,而且预先表示过猫儿哭老鼠的哀悼——凯)其实这句话由于新策略的执行,这句话也没有说对,倘若这些人的估计是对,那也是对中国的损失”(见干部必读国焘报告)。